

移民岁月

第7期

YI MIN SUI YUE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刘天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是城市工商业及行政事业单位无法完全容纳数量庞大的初高中毕业生,二是让知识青年到农村进行锻炼,以期“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这导致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宁夏此段时期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移民浪潮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从北京、浙江等地迁移到宁夏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大批知识青年;二是宁夏内部从城市迁移到乡村的大量知识青年。他们为宁夏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也使他们自身得到了锻炼。

宁夏银川市等城镇的知识青年从1968年开始一批批地奔赴宁夏各地的农村“上山下乡”。1968年10月20日,银川市首批200名初中、高中毕业生分赴海原、泾源山区插队落户;同年12月25日,自治区革委会和银川市革委会联合召开动员知识青年、城市居民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会后,各市县知识青年、城市居民掀起上山下乡热潮。1974年12月3日至12日,自治区第一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银川召开,全区已有3万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外省到宁夏“上山下乡”的主要是北京、浙江、天津等地的知识青

年。1965年6月7日,北京知识青年第一批600多人到国营暖泉、平吉堡等农场落户,截至当年11月10日,北京知识青年分7批共有4300多人到达宁夏;1965年6月至10月,平吉堡、暖泉、前进3个农场安置北京、天津知识青年4486人;1966年7月11日至9月30日到宁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浙江省舟山专区知识青年分两批共800人,在青铜峡县插队落户;1966年8月26日参加宁夏社会主义建设的浙江省杭州市知识青年300多人到永宁县插队落户;1968年9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知识青年67人到达银川,随后到达六盘山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条件不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也不尽相同。1961—1962年,宁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全部由国营农、牧场来安置。从1963年起,宁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才是插入国营农、林、牧、渔场。1973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一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在人民公社生产队中建立青年点;二是以下乡知青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三是在

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四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

从1961年开始,到1978年年底,宁夏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共达49100人,加上接收来自北京、天津、杭州等地的8300名下乡知识青年,实际安置的共计为57400人。1963年以后,宁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升学、招工、征兵、提干等途径,多数人陆续离开农村,走上了新的岗位。到1980年9月底,全区仍留农村的只剩4500余人。

1980年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对仍留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公安、粮食、知

青办等部门共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办理回城手续,并分别给予安置就业。

1979年5月18日至24日,全区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召开。从1968年起至1978年,全区共动员安置5.6万多名知识青年下乡。根据中央精神,不再动员上山下乡,并争取在两三年内逐步安置好下乡和留城知识青年,标志着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进程的结束。此后的几年时间,绝大多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被安置到城市的各领域工作。北京、浙江等地的知识青年有些返回原地工作,有些被安置到宁夏各城镇工作。

外省、市知识青年来宁夏上山下乡人数统计表

单位:年、人

动员地区	年限	来宁夏上山下乡人数		
		插队	国营农、林场	合计
总计		2100	6200	8300
北京	1965		4500	4500
天津	1965	300	1700	2000
杭州	1966	1800		1800

当代宁夏移民浅析

(1949—1979年)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社会进步。1958年11月18日《宁夏日报》报道,从北京、上海、河南、陕西等地迁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移民已有14万人,这批外来移民加快了宁夏社会的发展进步,极大地改变了宁夏的人口素质。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末,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运动,宁夏成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从辽宁、北京、河北、安徽、上海、天津等沿海一些城市向宁夏迁入长城机床厂、青山试验机厂、西北轴承厂、银河仪表厂等大中型工矿企业和大量职工。这些迁建企业的职工及其家属是这一时期宁夏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城市早期移民的一个重要来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曾为宁夏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宁夏历史上的知青移民若从1964年算起,为27869人。而如果上溯至1959年的浙江支宁青年则总数至少超过9万人。知青除少数安置在国营农林牧场,多数都是在永宁县等队插队落户。据资料显示,1962—1979年,仅浙江省到宁夏的知青就有1800余人。其中大部是杭州知青。

一段不能磨灭的印记

——在青铜峡插队的日子

钱淞舟

能干。睡到了半夜,大家觉得炕越来越热,有些发烫了。“不好,太烫了!”有人喊了一声。4个人都从炕上一个蹦子跳下来,黑暗中,看到炕上有的地方发红冒烟了。“快!泼水!”大家七手八脚用脸盆端来水,泼到了炕上……“轰!”炕面塌了,这下可傻眼了,因隔壁是女生宿舍,所以4人只好蜷缩在墙根到天亮。第二天,队长来了,问我们烧了几个麦柴,那个青年说烧了3个,队长又气又好笑地说:“咋没有把你们烤熟。”接着队长派人砌上新炕。这次烧炕差点造成一场火灾,也让我们青年点引以为戒。

因我在上学时曾在学校出过黑板报,有点美术基础,就抽我去公社写语录、画毛主席像。记得有一次,我和另一位知青被借到永宁县化乐桥边的唐渠管理所,在高3米宽8米的墙上画一幅画。当时离我们住的地方有十几里路,中午没地方吃饭,啃一些干馍,喝一些水,接着干到太阳落山。一天,我们在返回路上实在太饿了,摸摸兜里有几毛钱,就想去路边的供销社里买些吃的。可是供销社里能吃的只有放了好长时间的硬糖块,我们每人买了10粒,用

来充饥。大概是时间长了,又跟肥皂放在一起,吃到嘴里有一股肥皂味,又没有水喝,越吃越渴,因实在太饿了,硬是嚼碎咽到了肚子里。到了年底分红时,我的工分比其他知青都高。因借出去画画,队里能向借人单位结算现金,队里就给我计最高分。年底除扣了口粮、油、柴、菜等款项后,还分了60元现金。我拿到了这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后,就邀请几位知青结伴去了公社一家烩肉馆,请每人吃了碗烩肉,解了馋。我又特意买了一包当时公社供销社里最好的“光荣”牌香烟。点了一支,抽了几口,感到又苦又呛。我就掐灭了这支烟,把剩下的那包烟给会抽烟的知青。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抽烟,也是最后一次抽烟!

1969年底,石炭井煤矿到青铜峡来招工,主要以舟山知青为主。因为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每次招工我的政审都通不过,全队只剩我一个知青了。这次还是因为政审的原因,招工名单上仍没有我。就在他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队长敲开了我的门,兴冲冲地说:“小钱,收拾行李,明天去煤矿!今天刚定

当代宁夏移民的历史影响

一是对政权建设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配备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抽调了一大批精通业务、党性强、素质高的干部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各级领导班子。这样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来到宁夏,无疑对宁夏的政权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宁夏的政权建设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对经济建设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伴随着宁夏工业的发展,从沿海城市一些企业抽调大量人员和设备来到宁夏,建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新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当时规模还不大,但是生产设备比较先进,产品水平较高。为宁夏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三是对科教文化建设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批调入的科技人员及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对于宁夏人口文化素质、传播新型价值观念、扩大社区文化需求的功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这些精英核心不断辐射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能量,从而激发了本地潜在的社会活力,为宁夏培养了大量的高等学历人才,有力促使宁夏文化迅速崛起和发展。

(王晓华 供稿)

往事回顾

志在开发大西北的吉鸿昌将军

很多人都知道吉鸿昌将军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面对敌人的枪口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壮言,但知道他1929年主政宁夏时,致力于开发大西北的人就不多了。

1929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第十军军长,驻军兰州。吉鸿昌立即以军长名义,布告安民。布告中有云:“本军所到之处,只分良莠,不问回汉。”布告一出,很快就使原先因战争而关门的商店重新开业,紊乱的机关恢复秩序,深得当地的民心。1929年7月中旬,冯玉祥再次电告吉鸿昌,令其暂代宁夏省主席,同年7月25日,举行就职典礼,吉鸿昌照例当众宣誓,发表施政方针。

鉴于宁夏省面临瘫痪的现状,吉鸿昌提出了“恪安职守,遵纪守法,摒除暮气,提高效率”的严格要求。与此同时,为了体现他的新政思想,特依据其施政方针的精神,归纳成言简意赅、用以自勉与勉励僚属的奋斗目标:“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旋认真而工整地将此语亲笔写在自己的照片上,加印百余份,分赠各厅、局、县长以及所属师长旅们。当时的西北,虽然资源较为丰富,但交通闭塞、气候恶劣,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很落后,再加上连年的战争以及腐败的政治,严重阻碍了西北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吉鸿昌就任省主席,决心为民兴利除弊。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上写道:一、筹备发行日报,暂定名为《宁夏醒报》。二、刷新吏治,直接同百姓见面。三、回汉团结合作,携手开发宁夏。四、军队助民劳动,骡马借与民间耕种。五、阿拉善旗与省府关系中断,应设法恢复。六、藉武术表演大会,融洽军民关系。七、开发西北,军队屯田戍边……

这时候,他的僚属中有一部分人有了想法,认为宁夏不是久居之地,再加上战火不断,随时都有可能被上级调拨,开发大西北又不是短暂时所能奏效的事,何苦呢。吉鸿昌也自知主持省政非己之所长,打仗才是他自己的本行。但他没有在困难面前趑趄不前,而是把治理宁夏、开发大西北视为革命的任务,决心在这块地方实现自己为民造福、救国救民的夙愿。

吉鸿昌开始为开发大西北寻求支持者和合作者。他先是耐心说服他的僚属中的豫籍老乡。他充满激情地对他们说:“如果能在外边买一些新式武器运进来,改变一下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那可是如虎添翼呀,到那时这里肯定会变成一个全国有名的大粮仓,……听说这里地下矿藏也不少,有待于我们开采。”为了进一步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这一行列,他针对许多家居中原、不愿扎根西北的官兵,创办了一个“拂晓读书会”以教育这些人。读书会先吸收团以上军官参加,以后发展到营级军官。在一次学习会上,他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宁政 丁金尚 整理

六盘山位于宁夏南部隆德与固原交界处,地跨甘肃、宁夏两省区。因山体陡峭,攀山大道有六盘而得名。山势挺拔雄伟,素有“关中项背,河陇咽喉”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为挽救民族危亡,北上抗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千难万险,于1935年10月5日抵达宁夏西吉境内,7日经过隆德,翻越六盘山。时国民党军前堵后追,重兵环绕,形势险恶,经激战败敌于固原青石嘴等地,挥师东去。是年8月18日红二十五军由杨家店越六盘山。次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亦先后路经六盘山地区。

六盘山乃红军长征所越最后一座高山,名彪史册,毛泽东同志曾赋《清平乐·六盘山》词证之。

为纪念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50周年,经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批准在六盘山上修建红军长征纪念馆。纪念馆由宁夏建筑设计院设计,隆德县建筑公司承建,1986年10月建成。

六盘山主峰海拔2940米,纪念馆位于海拔2900米处,依山坡而建,由平台广场、浮雕、亭阁三部分组成。亭前坡上是200平方米的平台,毛泽东书写的“六盘山”三个红字

说:“你们知道,我经常考虑开发大西北的问题,甚至新大陆探险,打通第三国际等,而这是少数人的力量难以办到的事。因此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成为我志同道合的伙伴,同我一起来干。”结果,“拂晓读书会”办得很有成效。他在给冯欣农的一封信中写道:“西北地域广大,有着极大的开发潜力,且民风淳朴、百姓勤劳,宁夏得黄河之利,赛过江南。弟正在筹划开发大西北事宜,惟缺乏科学技术人才,诸如农业、水利、交通、地质等方面之人。这里对于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他还利用恳谈会等多种形式,说服一些青年军官。

吉鸿昌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为开发大西北争取到了多数人的同情与支持。于是,他自任“开发大西北总指挥”。他认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决心另一方面,将标志着开发大西北的议论阶段已结束,开始了计划与实施阶段。同时,他还印制了名片,背面印有:一、开发大西北安定民生。二、实行兵工政策。三、反对内战,枪口绝不向内。他将部队临时出兵修整被破坏的道路和桥梁等的作法,改为兵工方式,将筑路造桥和植树造林的任务,纳入开发西北诸任务中的一项。另外,他还要求部队:在收获高潮的半月内,可以停止训练,全部投入农事活动官兵的生活,各部队自行解决,不得借故扰民。

吉鸿昌感到光是这些还不够。针对当时的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官僚作风,他在省政府再次提出了“清除暮气,廉洁清正”的口号,藉以冲破习惯势力的藩篱,触动改变“做官当老爷”的腐败现象。他相信自己生气勃勃的领导,至少可以给这块沉闷僻壤注入新的活力。

他定名的《宁夏醒报》,特辟读者来信一栏,欢迎各界人士对地方行政加以评论,提出意见。他还直接以省主席的名义,向全省发出通告,表明为民作主,直接为民众解决一些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吉鸿昌把直接同群众见面发现的问题,作为整顿吏治的突破口,并结合推行政令困难的现状,组织吏治考察团,分赴各县进行考察,力求革除弊端,重开官场新风,并恢复了定期举行朝会的制度,听取汇报并指导各项工作。

吉鸿昌除了大刀阔斧地刷新吏治以外,还组织了一次军民游艺大会,藉以融洽军民军政关系。与此同时,吉鸿昌还要求各中小学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并把发展学生的体育运动看作是建设宁夏、开发大西北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在吉鸿昌积极为开发大西北而努力奋斗时,1929年10月,宋哲元、刘郁芬等27人,发表讨蒋通电。11月,蒋介石、冯玉祥两军在河南发生激战,吉鸿昌奉命率部参战。至此,他的开发大西北的计划不得不停止。但他在宁夏励精图治,努力开发大西北,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他处处为民众着想,替百姓办事,赢得了“好主席”的美誉,也在开发大西北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据《团结报》)

镌刻在一块长2米,宽0.8米,厚0.2米的黑色长方体花岗岩碑上。这块碑是1995年8月第二批来固原地区挂职的13位浙江干部个人捐资重建的。碑石料是产于东北的黑色花岗岩,由浙江省萧山市天然石材有限公司派人专程购石,并按“六盘山”原字样,精心刻制成重1600公斤的新碑。同年12月9日到六盘山上落户,显得庄严肃穆。沿着梯形台阶拾级而上,由水泥雕栏围成一个长约8米,宽约5米的椭圆形花圃,花圃中小松树郁郁葱葱,花圃两侧为半圆形台阶。沿着台阶继续往上,迎面是一幅长8米、宽3米,描绘当年毛泽东率领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大型浮雕。山顶上亭阁为中国传统飞檐式琉璃瓦结构。亭子由三圈汉白玉雕栏相围,中间由12根大理石柱相撑。正面亭沿下的栏柱中镶嵌着一块长1.5米、宽0.5米的大理石匾,上面镌刻着由胡耀邦题写的“长征纪念馆”五个金字。亭子中间立着一块长5米、宽3米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正面雕刻着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手迹,背面雕刻着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题写的碑文。

1995年10月,纪念馆被中宣部、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